

# 打回老家去

王霞★著

常恩多想起周恩来写给他的信：“主动在我，命运同我，光明在望，后会有期！”  
常恩多笑了，在这黎明即将到来之时，在中国的抗战走向胜利的途中，他把这支队伍交到了人民手里，把这支武装带上了光明的大道，他可以安心地走了。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# 打回老家去

王霞★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打回老家去 / 王霞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5. 4

ISBN 978-7-5068-4923-4

I. ①打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96285 号

打回老家去

王霞 著

策 划 王 平 陈复尘

责任编辑 游 翔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封面设计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41.25

字 数 610 千字

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4923-4

定 价 7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常恩多将军女儿常征（左二）、孙子常景兴（右二）、外孙黄岩松（右一）正接受作家王霞（左一）的采访

## 论隐蔽埋伏（序）

刘祖荫

1942年8月3日，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，东北军第111师、中将师长常恩多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共同领导该师，在山东省东南的甲子山区英勇起义了，给国民党反动派“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”政策予以有力的一击！

我作为一名中共秘密党员，参与组织了那次起义。由于1941年2月的第111师顽固派的所谓“肃清左倾分子”事件，东北军111师的中共秘密组织受到很大的损失，仅有三个秘密党员保留下来，我是其中的一个。

在1941年“二·一七”反动政变后，白色恐怖严重，硕果仅存的几个秘密党员是否撤退，一直是当时面临的重大问题。即或“八·三”起义前夕，失去联络一年多的党组织刚接上关系，所得到的指示仍是“立即撤退”，否则，“开除党籍”。张苏平是立了大功的，他权衡形势，坚决顶住，要不，后果不堪设想了。

“八·三”起义后总结经验，仍有人强调，环境恶劣，理应撤退。或是说：继续坚持，无大作用，王振乾（亦名王维平）曾以我为例说：“小刘不是留下来了么？而且在（国民党）政治部里。”国民党军第111师政治部是国民党部队最反动的机关，尚有中共秘密党员的容身之地，前后达四年之久，在恶劣环境中坚持工作并不是不可能的，最后发挥了作用。

我与国民党军第111师政治部先后两任主任打过交道，一个是宋迪玺，另一个是龚晓清。

1938年10月，东北军111师政治部在江苏淮阴的《战报》上登广告，招考义勇宣传队员，我报名应考被录取了。11月中旬去57军军部驻地西坝报到，在这里等候111师派人派车前来接走，111师驻地在沭阳，相距百余里，在此候命较久，没见到57军政治部主任，仅知有督导员龚晓清，他是军政治部职位最高的官长。

我去57军军部报到，同行还有几个女青年，其中一个是我的女友许雪华，她本是淮阴省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的职员，我由上海孤岛投奔在淮阴的胞兄刘祖望处，求学未成，因我胞兄在省立民众教育馆工作过，与许家姐妹熟识，我也就认识了许雪华，仅仅几个月，我们就擦出爱情的火花，她不愿与我分离，竟放弃图书馆的工作，与我及她的几个好友一起参军。她没有参加考试，但她认识江苏省政府无线电台台长黄某，此人与龚晓清熟识，请他写了推荐信，据许雪华说，其中也有我的名字。果然管用，龚晓清见信后就全部批准我们入队了。

不料好事多磨，许雪华母亲变了卦，约会许雪华好朋友的亲属，向黄台长大兴问

罪之师，逼着黄台长与她们一起来到西坝要人，大哭大闹了一天，终于追回许雪华和她的好朋友，仅洪孳兮是孤女，父母早亡，她留了下来。

黄台长与我亦相识，我估计他是军统成员，他参加过蒋介石庐山“剿共”集训，他曾将厚厚的蒋介石“剿共”演讲集借给我阅读，以我当时的觉悟，对此不屑一顾，但我自幼家教熏陶，待人以礼，仍是很尊敬他。西坝告别时他一面表示十分无奈，为许母纠缠做了违心事；一面告知我，他已向龚督导员作了交代，要我安心在东北军工作，前途无量。

黄台长究竟向龚晓清交代什么，我不得其详，但在以后的经历中，却时时有它的影响。

1939年秋，我参加中共秘密组织不久，发现一重大秘密，那时我们驻在甲子山南麓的小房前村，我与李承仲、邵曼伯同居一屋，一天晚上，我早早睡下了，李承仲出外串门未归，邵曼伯在油灯下伏案写家信。我尚未睡着，李承仲风风火火回来了，他来到我床前喊我，我装睡未理他，他兴冲冲地与邵曼伯谈话，说他去了政治部，听他们评论宣传队，他们说南通参加的老队员里有共产党，特别可疑的是6月大“扫荡”时，不经政治部而在地方招收的新队员。说到这里，李承仲又来到我床前唤我，我仍装睡，并有轻微的鼾声，他转回去与邵曼伯继续谈话，邵问：“小刘是不？”李嗤之以鼻，说：“他幼稚，不是的。”及至天明，我就向组织上反映了，除保持警惕外，还在群众中揭发李承仲“狗腿子”的丑恶嘴脸，李承仲察觉此事，竟找我解释：“小刘，你不要紧张，没你的事，在淮阴参加的新队员数你后台硬，你是有‘八行书’的。”所谓“八行书”就是推荐信，我明白，那是指黄台长的推荐信。其后，邵曼伯与李承仲疏远了。“二·一七”反动政变后，邵曼伯返乡参加了新四军。

师政治部主任宋迪玺对我另眼看待，1940年初，他派我带一个组前往665团开展工作，临行前他单独召见我，说：“八路军115师到了鲁西，这是老八路，不像山东纵队土八路，好对付，他们善于做兵运工作，你这次去，就是要防范八路军，注意我们的官长有没有和八路军来往，特别是带兵官，更危险，有这方面情况，要赶快向我报告。”我唯唯诺诺应承下来。据我所知，派往各团的宣传队员，从没有被主任单独接见过，而且有如此赤裸裸的反共指示。

1940年春夏之交，宋迪玺升任57军政治部主任，遗缺由龚晓清继任。这年6、7月间，新上任的宋迪玺忽然送信来，要紧急召见我，我急忙前往军部驻地临沭县东盘村，宋问我有无军官与郯城、码头一带的八路军来往？有无观看《大众日报》？我说：“未发现与八路军来往的官长，《大众日报》老百姓家家有，随手看看是有的，和八路军来往的却没有。”宋问：“董团长怎样？”我说：“他执行军部命令很坚决，平时来往不多，665团没有中校团附，少校团附管松涛管事，我经常找他办事，他为人厚道，没有出轨言行。”谈话时他拿出一张《大众日报》，上面刊载郯城开军民联欢会，57军有人参加，还讲了话。宋严厉地说：“你回去查查，你们团是不是有人参加，私通八路，那是很危险的。”我说：“郯城、码头四通八达，每逢初四、十五，都有大集，军部、112师去的人也不少，我一定遵照指示，好好查一查。”宋迪玺点头，说

他还要112师查查。并再三叮嘱有什么情况，赶快报告。我十分紧张，但窃喜，《大众日报》上说的“57军代表”其实就是我。

这年9月，发生“九·二二”锄奸运动，与徐州日军订立“互不侵犯，共同防共”秘密卖国协定的57军军长缪澄流被赶跑了，宋迪玺参与此事，跟缪澄流一起跑了。从此，我不再和宋迪玺打交道，而是和111师继任主任龚晓清打交道。1941年2月，借常恩多患重病不能理事之机，师参谋长陶景奎与331旅旅长孙焕彩合谋，发动了反动政变，以333旅旅长万毅为首的进步军官和进步团体被扣押，我也在劫难逃，与义勇宣传队一起被集体扣押了，我是七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，领导反迫害斗争，特别是绝食斗争，终于获得胜利，就地解散，避免了送往集中营的厄运。七人领导小组成员曾被单独扣押，并逐个传唤、审讯，单个隔离审查。几乎全部被龚晓清审问了，唯独我，没有被审问。宣传队解散时，大部分离队，七人领导小组全部押送出境，就是我一个人竟被留下了，事后听说，陶景奎有意，龚晓清自告奋勇，说：“要留，就留师政治部吧！”我留在师政治部与郑冷一起编辑《阵中日报》，龚晓清不止一次谈起黄台长对我的美言，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：“你不是共产党。”我这才解开不被审讯而被留下的疑团。

当然，不仅仅是客观因素，也有主观因素。我这个人不爱出风头，不夸夸其谈，含蓄、自律。1940年9月，义勇宣传队奉命在军部集中，支部书记周丕炎与我谈话，说：“由于叛徒告密，王秘书（即王维平，现名王振乾）在军部被扣押，组织上决定，在57军的中共秘密党员全部撤退。”<sup>①</sup>我这才发现，很多宣传队员没来军部集中，如邹强、黄毅、王冠宇、李倩、孙勇、王政等人。他继续说：“还要撤退，考虑到你面目灰色，情况好一些，决定你最后一个撤退，担任掩护任务，想征求你的意见。”我表示同意，他交代：“撤退要晚一些，可以到山东纵队九支队找刘司令接关系，你的代号是‘亥’字，可要记牢。”又说：“你将失去党的关系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你要以一个抗日的有正义感的公民身份坚持下去。”

我留师政治部编《阵中日报》，主要登载重庆广播的各战区战况和国内外时事新闻，也有一些反共的文章，主要是各团政训员们写的，我的办法是压稿不登，如果找我的麻烦，我就搬出重庆中宣部的一个文件：“对于同中共之间的军事冲突，非经中央批准，不准自由在报纸上公布”，“公布应以严正忠告的态度，不得以挑衅的态度”<sup>②</sup>，说明此稿不能刊登的理由。我写社论，都是正面的、积极的，如论长沙三次大捷、德苏战争的性质、战局分析，日本南进、北进的预测等等。按照师政治部某些人的阴暗心理，都希望德国法西斯胜利，希望日本侵略者北进打苏联，他们反苏、反共是一脉相承的，而我却写苏联必胜，德国法西斯必败，不仅一论，而且二论、三论，我所以敢如此写，因苏德战争爆发时，重庆中宣部有过冠冕堂皇的宣传要点。我是本此精神写的，无可厚非。日本南进、北进的分析，我果断地指出南进。不久，日军对珍珠岛偷袭成功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我的预见变成了现实。我编辑的《阵中日报》不仅本师官兵欢迎，好评如潮，甚至发往鲁苏战区的样报，也同样得到青睐。有人专门到111师政治部要亲眼看看社论撰稿人，与此相对照的，战区政治部出版的铅

印《阵中日报》经常闹笑话，如要闻头条“顾维钧大使专访白宫”，误将“大使”排成“大便”，令人啼笑皆非。龚晓清对我写的社论从不过问，不像宋迪玺，没有他的签字，不准发表。

最为难的一次是1941年夏，龚晓清找我，让我看了一份八路军的传单，传单上劝告东北军111师尽弃前嫌，共同抗日。他然后就指示我起草一份严词驳斥的文章，作为反宣传散发出去。我不敢不接受，但又很为难，我不愿违心地写一篇辱骂八路军的文章，我局促斗室，愁眉深锁，一个下午没写几个字，恰巧散步时遇见张苏平。我和张苏平没发生过党的关系，但我估计他是我们的同志，根据是，他和宣传队女队员李倩有恋爱关系，而李倩和我是同一支部的，她是组织委员，我是宣传委员，李倩不可能与非党人员谈恋爱。我就向张苏平求救。张说：“你就给他瞎写。”一语道破，顿开茅塞，第二天就写成交卷。隔一天，龚晓清找我去他住处，他批评我写的绕了大圈子，讲什么张学良“兵谏”，三位一体，完全是东北军的那一套，应站在中央的立场上予以讨伐。接着他从抽屉里抽出几张毛边纸，有他亲笔写成的传单，我仔细阅读，说：“主任，你写得真好，我再熬两宿也写不出来。”龚晓清颇为得意，我想，这是我写的，与我无关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111师反动派头子陶景奎，他对我的存身立足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陶景奎是陆军大学毕业的，政治上反动，日常生活却有儒雅之风，他很看重我的文笔，他曾对我说：“全山东就两个人可以帮助我整理文稿，一个是山东省政府某科长，另一个就是你。”我去665团前，一度为《烽火报》写社论，他就开始赞赏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“二·一七”反动政变，义勇宣传队被集中扣押，开展绝食斗争时，我受命以集体名义给陶景奎写信以死抗争，这封信不是白话文，也不是半文半白的官家体，而是离骚式骈体文，其中四六句声情并茂，对仗工整，朗朗上口。绝食斗争胜利后，陶景奎曾找领队周丕炎谈话，问这封信谁写的？他不待回答，就说：“我猜是刘祖荫写的，那么哀婉凄切，悲壮激昂，我差点掉了泪。”再就是我帮王秀写的几篇呈文。

王秀是宣传队的女队员，她是三界首战斗牺牲的周连长的遗孀，南京下关人，与我有乡亲之谊。1939年夏日军大“扫荡”时，李倩号召大家拜干娘密切军民关系，王秀拉我在阎马庄拜了中年寡妇做了干娘，从此，我俩成了干兄妹，她在感情上、生活上对我有很多眷顾。义勇宣传队被集体扣押，绝食斗争胜利后，七人领导小组仍被扣押，其他人暂时恢复自由，及至5月，师部由朱磨村转移甲子山区。不久，义勇宣传队被解散，去向自报，一部分人要求去重庆大后方，如周丕炎，他的初恋情人黄海燕在重庆，他将去投奔会面。多数人是回老家，本地人好办，说走就走，而外省人则要经过敌占区，乘火车或海轮返家，如邹强、孙卜菁、王英才、王衍、邵曼伯等人。我自报返乡。个别人被留师工作，如徐振宇、吕梦林留干三队教书。王秀自报什么，我没过问。这天通知，去重庆大后方的一批人出发，到总部与51军前往皖北领取弹药的部队一起西行。就在这批人动身前夜，王秀来到我们被关押的院子，她说自报去



一个陌生地方，被陶参谋长召见，要她留下嫁人，出言不逊，举止轻佻，王秀严词拒绝，表示要和宣传队的人商量后答复，经陶景奎同意，来这里求援。这时周丕炎准备次日登程，无心过问，就把此事推给我，我与王秀商量，她说：“陶景奎不怀好意，不能留下，我去某处是假，准备过渡一下，返回南京，你不自报返乡吗？到时我们再联络。”我就帮助王秀写呈文，接连两封，均被驳回。这时，夜色降临，周丕炎等人都睡下了，就我俩挤在一盏油灯下，在小饭桌上起草呈文，一改前两次婉转求情的色彩，而是言辞凌厉，讽刺挖苦，一副豁出来拼了命的架势。我写好后让王秀誊抄，再交卫兵送出，我说：“好困，我先睡了，誊清了上交，我不看了。”王秀含泪点头，伏案誊抄。我打开被子，在靠外头的地铺上睡下，很快睡熟了。不知过了多少时辰，忽听窗外卫兵高喊：“参座批件！”我猛地醒了，发现王秀不知何时挤入被内同枕共眠，一只手搭我胸前，鼻息拂人。我赶紧起身出屋接回批件，重拈油灯，王秀鬓发蓬乱，睡眼惺忪，两人打开拆封，只见呈文上大笔划个“可”字，王秀如愿以偿，莞尔一笑：“谢谢哥！”晨曦已现，大家忙着起身洗漱，一片慌乱，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现象。

我被释放后，陶景奎故充风雅，把我当成他门下清客，不时找我前往他住处下围棋，或是帮助他整理文稿，有时留我吃饭，有时派勤务兵给我送瓶炼乳，还问问师政治部情况，谈谈宣传队的一些往事，他谈及王秀的几篇呈文，他估计是我写的，尤其后一篇，“骂得好凶。”我一面赔罪，一面估计效果：没准是歪打正着。果然，他动了惜才留人之念，陶说：“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参谋处好几个人给你讲好话，那都是王秀前夫的同学、好朋友，参谋主任张沼看不惯，找王秀训了一顿，不准她乱串门子，托人保谁放谁的。”

这时的陶景奎大权在握，常师长患病不能理事，交给他代拆代行。我与这位炙手可热的反面人物来往，师政治部先存三分敬畏之心，认为我有靠山，减少了很多麻烦。

就是这样一些偶然或是必然的、主观的或是客观的因素条件汇合交织在一起，成就了我四年秘密党工作所取得的成绩，这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，百年难求，我应该十分珍惜。

事实上，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，总感到这里太窒息，太苦闷，总想走出这一困境，到抗日根据地去，到八路军那边去，呼吸新鲜的自由的革命空气。1942年春节，日军“扫荡”甲子山区，我与郑冷被疏散，暂住郑冷家乡的邵疃村内，我认为这是好机会，我说通郑冷，要他带路投奔抗日根据地去。不料忽患风寒，发高烧，不省人事，郑冷慌了，雇请民夫把我抬回111师石场村驻地治病，病治好了，投奔抗日根据地的机会却失去了。

日军“扫荡”撤走后，111师恢复原态势，鲁苏战区统率机关移入甲子山区内，与111师师部相隔仅数里之遥。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，号称复兴社十三大太保之一，他视察111师，到师政治部训话，湖南腔很重，但左一个“奸匪”，右一个“奸匪”，反共的调门高极了。111师政治部“反共”气焰更为嚣张，原宣传队留下的三个人徐泽生、郑冷和我在一起商议，认为环境太恶劣，走为上策，分别写了请长假的

报告，龚晓清出面挽留，终因去意已决，只好准假。徐泽生本地人，立时走人。郑冷要和我一起走，稍晚一步。考虑到与陶景奎的关系，我在临走前夕向他辞行，陶说：“常师长交代了，你们宣传队的人去留要向他请示。你明天再来，听我的消息。”不料第二天传来消息：“常师长说，刘祖荫不能走，政治部不给饭吃，师里给饭吃。”这就安排我与郑冷都到莒日联中去教书，这是所新成立的为111师军官眷属子弟开办的中学，张苏平兼任校长，薪酬高于师政治部。

徐泽生返家不久，就投奔抗日根据地，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，见了原中共111师工委领导之一曹健华（易名华诚一）。曹健华时任抗敌自卫军政治部主任，他派徐泽生返回111师传达指示，要留下的秘密党员全部撤退，为张苏平拒绝。隔日，徐泽生返回山东分局见到中共111师另一位工委领导王维平，谈到他奉命回111师传达指示的经过，王维平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曹健华一个人决定不好，你等等，我给江（华）主任汇报后再说。”第二天晚上，仍在王维平院子里，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江华与徐泽生见面，问了些111师的情况后说：“这几个人继续待下去行不行？”徐说：“问题不大。”江说：“那好吧，你还回去，告诉他们不要撤，不能工作，个别交朋友。”徐讲了他的情况，去一次可以，再去就危险了，言之再三，江华最后说：“如物色到人，你就不去，否则，你还得去一次。”等候一周，说物色到新人了，徐泽生便留下工作。新人即曹成镒，他奉曹健华之命再次前往111师。曹成镒原是义勇宣传队队员，“二·一七”反动政变前，随661团前往皖北领取弹药，一去一年半，1942年夏随661团返回甲子山区，打发回家不久，对111师依然熟悉。他直接来到我住处，传达两个指示：一条设法营救关押在战区总部的万毅旅长，另一条是全部撤退，否则开除党籍。这指示是矛盾的，既然撤退，何能营救？又是很严厉的，徐泽生是非党群众，而曹成镒是中共党员。谁也不敢拿党籍开玩笑，张苏平面对这一严厉指示，一面表示准备执行，一面布置我和张德福（师特务连排长）注意紧急事态发展，因为他已与郭维城取得联系，得到即将举事的信息。他还从662团团团长孙立基处证实：常师长病危，当权者剑拔弩张，可能内讧。就在这决定生死的时刻，历史车轮突然向我们一方启动——“八·三”起义爆发了，我和张苏平都是常师长病危托孤的对象，立时行动起来，曹成镒本是监督撤退的特使，一下子变为返回山东分局报告起义喜讯，请求援救的特派交通，真的是千钧一发！

起义当天，111师政治部主任龚晓清被扣押，与反动将领陶景奎、刘宗颜、刘晋武等人一起被关押在工兵营。翌日，张苏平和我接受任务，改换了干部训练二、三队的领导，立时武装干二队，受命扣押师政治部全体人员。外号“胖子”的文书被他们派来找我，要求“网开一面”。我讲我无权处理，他说：“我们全明白了，你说句话，很管用的。”8月6日夜，师工兵营叛变，龚晓清借机逃脱，但师政治部全体人员却被押往抗日根据地内。其后，按共产党的政策，全部释放了他们。

8月8日，111师起义部队2700余官兵在小房前村集合，9日凌晨，常恩多将军把起义部队交给共产党就与世长辞了，因情况特殊，秘不发丧。代师长万毅召集起义部队营以上军官开会，我与会了，见到饱受牢狱之苦的万毅。只见他仍然神采奕奕，

高兴地对我说：“小刘，你坚持下来了，好样的！”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哽咽无语。

其后我得知：重庆军委会悬重金通缉常恩多、万毅、郭维城、孙立基和我。我想：我一个小小的中尉，怎么和起义将领常恩多、郭维城、孙立基及逃到解放区的万毅等量齐观，再想想，国民党政治部吃了大亏，恨透了我，这在某种程度上，验证了我隐蔽四年的重要价值。

“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，反对急性和暴露。”<sup>③</sup>

——对照毛主席有关党的方针，那就是非清楚，一目了然了。

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常恩多将军。我们一直以为他是东北军杰出的爱国将领、我党的好朋友。发动“九·一二”锄奸运动，蒋介石分析是“缪（澄流）、常（恩多）素有积怨”。“八·三”起义后，51军军长牟中珩曾与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谈及此事，想不通常恩多为什么临死还要举行起义，投奔共产党。直至十年浩劫，这才查清常恩多将军是1939年春发展的中共特别党员，他生前未吐露半句，他是隐蔽埋伏在敌人内部的英雄，是111师秘密党工作的典范！

王震同志历经十数载研究、采访、创作，呈现给世人一部沉甸甸的文学著作。《打回老家去》再现了七十余年前腥风血雨的岁月，写出以常恩多将军为代表的一批生龙活虎的人物，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惊心动魄史诗一般的中华民族的抗战史、奋斗史！

生者欣慰，死者安息！

2014年5月28日于广州

#### 注释

注①：1940年“七·七”抗战三周年，中共中央指示：“在一切友军中（包括中央军、杂牌军在内）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，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，以便建立党的信誉，扩大交朋友的工作，争取二百万友军的继续抗战。”1940年4月，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项乃光被捕叛变，7月28日，中央军委电山东分局：“中央最近完全确定不在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，不允许任何部门对此决定有修改和保留，原有党员若不撤出，即一律停止组织生活。”1940年夏，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参谋长王玉章叛变，供认111师王维平、赵志刚系中共党员，山东分局紧急通知，57军内的中共党员全部撤出。

注②：这精神最早见于蒋介石1940年给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电报中，重庆中宣部以此精神发了个文件。

注③：毛泽东：《放手发展抗日力量，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91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引 子 邂逅 .....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别无选择 .....         | 4   |
| 第二章 渭南，中央军的死地 .....    | 14  |
| 第三章 “张副司令虑祸不周！” .....  | 22  |
| 第四章 找个共产党员当秘书 .....    | 34  |
| 第五章 杀上抗日战场 .....       | 54  |
| 第六章 保卫扬州 .....         | 75  |
| 第七章 转战苏皖 .....         | 91  |
| 第八章 会战徐蚌 .....         | 103 |
| 第九章 驰援武汉 .....         | 125 |
| 第十章 到鲁南打游击 .....       | 144 |
| 第十一章 中共特别党员 .....      | 178 |
| 第十二章 粉碎鲁南大“扫荡” .....   | 192 |
| 第十三章 乱世多磨难 .....       | 219 |
| 第十四章 陷落困境 .....        | 240 |
| 第十五章 较量 .....          | 264 |
| 第十六章 老蒋的法宝：畏敌者升官 ..... | 284 |
| 第十七章 危在旦夕 .....        | 298 |
| 第十八章 剑拔弩张 .....        | 316 |
| 第十九章 “九·二二”锄奸 .....    | 338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二十章 打鬼子咋就这样难 ..... | 364 |
| 第二十一章 不屈不挠 .....    | 392 |
| 第二十二章 恶浪扑来 .....    | 419 |
| 第二十三章 苦战 .....      | 438 |
| 第二十四章 孤臣孽子 .....    | 469 |
| 第二十五章 情势陡转 .....    | 490 |
| 第二十六章 迫在眉睫 .....    | 512 |
| 第二十七章 “八·三”起义 ..... | 527 |
| 第二十八章 奔向光明 .....    | 549 |
| 第二十九章 浴血鲁东南 .....   | 571 |
| 第三十章 于总司令梦断齐鲁 ..... | 616 |
| 第三十一章 打回老家去 .....   | 625 |
| 尾 声 何止竹帛流芳! .....   | 632 |

# 引子

## 邂逅

### 1

我几乎与他擦肩而过。

我，1960年生人，曾任北京军区38集团军铁流文工团编导，现任武警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作家。

他，生于1895年，卒于1942年，生前任国民革命军第57军111师中将师长，死后眠于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。

他，就是常恩多将军。

### 2

我来时，他已去，缘何相遇？

——缘在38军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我在军文工团任编导，曾得到一部刚出版的《38军军史》（以下简称《军史》）。38军一部是开国元帅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的部队，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誉为“万岁军”。军史是军旅作家成长的沃土，我如获至宝，可还没有捧热就接到通知，要我把《军史》上交回去。虽满怀疑惑，也只有遵命。几年后，在与老战友相聚中，我意外得到一个信息：当年收回《军史》，是因为其中对114师抗战时期起义的定性存在问题！这个疑窦被深深植入心中。

2007年，已调武警部队工作十年的我，在一次会议上前后看望两任114师政委——马政委和肖政委（注：1996年底，38军114师转隶武警部队），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希望我关注114师的历史，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抗日英雄和部队艰难的诞生经历——65年前的1942年夏，国民党东北军57军111师在中共特别党员常恩多将军率领下毅然起义，脱离了蒋介石的领导，投奔到八路军阵营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114师。

两任政委先后相告：时至今日，依然有人否定常恩多将军中共党员的身份，并由

此来贬低、污蔑他，并把他领导的“八·三”起义定性为“事件”。在前面所说的那一版的《军史》上，正是这么写的。这当然遭到了有良心的史学家和111师抗战老兵的坚决反对和抵制，这也就是为什么《军史》被收回去的原因！

此时，我虽不十分了解那段历史，但仅凭已知线索，不禁心生疑惑：常恩多将军在病情不治的情况下，在挚友郭维城将军帮助下发动起义，把部队带进了民主抗日根据地几小时后，他就去世了。没有誓死抗日的精神，没有尽忠报国的决心，一个国民党中将师长在病魔缠身时，完全可以到大后方重庆去养病，那里山高路远，没有日本鬼子的“铁壁合围”，更无须整日操劳抗日杀倭战事，何苦临死了还要把手中仅存的部队拉进共产党抗日阵营里来呢？！

于是，我小心提问两任师政委：以您政治委员的眼界看，常恩多将军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？

两任师政委都坚定而肯定地回答：是！我坚信他是！

### 3

抗日战争，距离我和我后来人越来越遥远，那些年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东北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？“西安事变”的发生是偶然，还是必然？

已是国民党中将师长的常恩多究竟是不是中共特别党员？为什么这样一个拥有“高官厚禄”的人还要背弃国民政府和老蒋而倾心中共？为什么人已将死，却还要率部起义，把仅存的部队交到共产党手中？

否认常恩多将军中共党员的人正是他当年的个别老部下，且曾经受到他教导、保护和培养的人。胸挂胜利勋章的他（他们），对于常恩多将军这个“缺席者”，在先是赞颂、感恩后，在权高位重时又反过来否定、贬损，甚至痛斥、责难。当年发生了什么事，叫他（他们）的态度和评价在不同时代竟然发生天壤之大的变化？

常恩多将军，你究竟是谁？你的故事是一段颂辞，还是一曲悲歌？

东北军57军111师走过了怎样的艰苦历程？她是一支畏敌如虎的弱旅，还是一支勇猛灭倭的强军？

### 4

在曾任114师师长（原111师老兵、中共党员）翟仲禹的儿子翟若冬引领下，我终于2009年冬在广州某干休所，找到了111师抗战老兵刘祖荫老前辈。刘老先生虽

年事已高，但耳聪目明，精神矍铄。他讲述常恩多将军和111师的故事，还把他一生研究、撰写和出版的《刘祖荫文史集》送给了我。一并送我参考研究的史籍还有很多，大都是他和111师老兵参与撰写、东北军研究学会主持出版的。

在研究和探索历史中，我不仅解除了上述的那些困惑，还意外认识了中国老百姓还不知道的抗日英雄——常恩多将军，意外认识了他和他的战友郭维城将军带进八路军序列中的这支部队。

史籍虽浩如烟海，但毕竟时移事远。牵肠挂肚了一百回，我望史生畏了一百回。

回身看，常恩多将军和他的战友们总在不远的地方迎候着什么，期待着什么。

扪心问，我若与常将军错身而过，与常将军领导的111师错身而过，还会有谁来到他们面前驻足？还会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，并将他们的英雄事迹昭告天下吗？

## 5

那就从1936年说起吧。

这一年，无论是在欧洲，还是在中国都发生了很多大事。

3月，希特勒宣布废除《凡尔赛和约》和《洛迦诺公约》，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。希特勒只用了区区4个旅的兵力就探明了英国和法国的底细——法国任其所为，而英国则姑息放纵。四个月後，德国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。

5月，日本借口保护侨民，又增兵中国华北。

9月19日，日军侵占丰台。

10月9日和22日，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先后会师于会宁和将台堡，准备对日作战。

同日，蒋介石飞抵西安，着手“围剿”红军。

11月15日，傅作义领导的绥远抗战爆发，24日收复百灵庙。

11月25日，德、日两国在柏林签订“反共产国际协定”。至此，日本加入德国、意大利“轴心国”三国同盟。

## 第一章

# 别无选择

### 一、东北军要改写历史

1936年12月10日清早，西安城天寒地冻，街上人疏车稀，偶有一队荷枪实弹、穿蓝色制服的西北军巡逻队走过大街。

常恩多骑在马上，在副官和卫队护卫下，打马向东大街金家巷一号疾奔而去。

常恩多，满族，字“获三”，东北军111师少将师长。紧随在他左右的是副官刘万胜、手枪排长王宗芳等官兵。

马队奔驰向前，马蹄踩踏冰雪的纷乱声响，和着呼啸的北风冲撞在空旷的街头巷尾。可在常恩多耳中，这坚硬而冰冷的声音仿佛就是三千万东北同胞悲凉的哭泣和哀号。——自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东北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已五载有余。五年多的时间里，东北军虽长城英勇抗日，但不久就退守华北，后转湖北“剿共”，今又围红军于陕甘，可就是不能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！不是他们不想，也不是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不愿，而是，蒋介石不许！

在这五年多的岁月里，蒋介石不言抗日，也竭力阻挠、破坏其他军队抗日。热河抗战中，蒋介石训令东北军“侈谈抗日者杀无赦”，其后，他一面向日寇投降，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淞沪停战协定》、《塘沽协定》、《秦土协定》和《何梅协定》，把东三省、热河、冀东等大片国土让于日寇，一面调集百万大军围剿红军，对红一方面军连续展开了五次围剿，并最终将红军围追堵截到了陕甘宁贫瘠之地；他一寸一寸地向同祖同根的红军“收复失地”，可谓“寸土”必争，同时又在向日寇一省一省地出卖国土、交出主权，也实谓慷慨大方。半个多月前，蒋介石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三原则，承认伪“满洲国”，并欲实现日、满、华关系正常化、经济合作及与日共同防共。蒋介石对日卖国求安，却在东北军、西北军包围陕甘的基础上，又调集30个师的中央军精锐部队和百余架新式战斗机、轰炸机，将陕甘宁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大有摧枯拉朽、斩尽杀绝之势。

更大的内战一触即发，东北军何时才能打回老家去？常恩多悲从心起。紧勒马缰，任由寒风冻雪刻骨割肉，他的心在疾呼呐喊：不！东北军一定要创造历史，东北军有能力、有机会改写历史！

常恩多挥鞭打马，奔向前去。